■ 政德镜鉴

晚明阉党专权擅政，国家社稷多难。袁化中虽官居下僚，却不惜冒死直谏，因而触怒阉宦，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等人惨死诏狱，史称“东林六君子”。百姓为纪念袁化中，在陕西泾阳建祠堂，在故乡立双忠祠，洒扫祭祀。

袁化中：碧血丹心劾阉党

□ 本报记者 鲍 青
本报通讯员 耿 军

晨曦微露身影，点点金光洒落，打碎了初夏的宁静，惠民鼓楼街两侧随即热闹起来。奔行的车流，赶脚的行客，吆喝的商贩，提醒着往来的看客，这里是辐辏繁华所在。

岁月前移百年，依旧热闹喧哗。每逢节日，双忠祠内，百姓如织，焚香祷告，顶礼膜拜。

这双忠祠，是明末清初惠民当地百姓捐资兴建的庙宇，以祭祀惠民历史上忠心耿耿的两位直臣。其中一位，是弹劾阉党魏忠贤，壮烈捐躯的“东林六君子”之一的袁化中。

“双忠祠现已不存，但袁化中官居下僚，不畏权势，为公义奔走呐喊，身虽死而神不灭的精神，值得我们铭记怀念。”惠民县党史办副主任孟书军说。

冥冥中有定数，五君子同榜高中

袁化中弹劾魏忠贤，至今仍在袁氏后人中激荡回响。

家在东北吉林的袁氏后人袁静坤告诉记者：“自小便听长辈言道，先祖袁化中老爷爷是因直谏而屈死于阉党之手。因为当时风声鹤唳，族人四散奔逃，我们一支先到乐陵避难，后又流落东北，但老爷爷的事迹，我们始终铭刻在心。”为了寻觅袁化中故迹，她曾从东北专程来到惠民，却依旧鲜有所获。

“袁化中生年不详，他字民谐，号熙宇，生于斯，长于斯。”孟书军说。惠民袁氏是家境殷实的大家族，人烟稠密，耕读为业。

袁化中少时聪颖，父母祖辈对他寄予厚望。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（公元1600年），袁氏中乡试举人，春风得意，来年会试却遗憾地名落孙山。他心情郁闷地回到故乡，屏退平时闲谈者，独自筑室修身读书。终于到万历三十五年，顺利考中进士。

纵览万历三十五年登科录，会看到如杨涟、左光斗、顾大章、周朝瑞等熟悉的名字。五人中袁化中的排名最靠前，为第三甲第29名同进士。

人生好似一条无径可寻的溪流，随意漫延流淌。溪流彼此间时相交，时分隔。

袁化中等人的溪流在此刻交汇，继而分流于外，待18年后又聚于一处，汇成一股澎湃湍流，迸发出最后的璀璨芳华。

“东林六君子中，竟有五人为同榜进士。似乎冥冥中，有因缘际会的定数，这实在难以捉摸，却妙不可言。”孟书军说。

知县内黄泾阳，行善政百姓称颂

吃尽十年寒窗苦，磨得铁板薄如霜。可纵然高中进士，也只是获得了做官资格而已。前方的路依旧坎坷，同样叵测。

分配职务的时候到了。经吏部文选司掣签，袁化中得任河南内黄知县。

职务是说不上好坏的“平庸”，但袁化中并未以平庸待之。他上任伊始，常青衫布履，深入田间民舍，微服察访，遍知闾里利病。针对当地吏治崩坏、胥吏扰民的弊政，袁化中以身作则，反贪倡廉，惩治了奸猾的胥吏。此外兴办教育，增设庠序，勉励青年向学。内黄境内晏清，百姓获利，衷心爱戴他。

正在袁化中改革内黄积弊之际，惠民的家父因病谢世。按明制，若父母离世，官员无论品阶大小，均需离职归乡丁忧守孝，待守孝期满，才能再度启用。守孝期满，朝廷改任他为陕西泾阳知县。

地处渭北的泾阳，相比内黄条件更加艰苦。当地水旱频发，农业凋敝，百姓贫苦。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，民尚私斗，以致民风彪悍，案件诉讼数倍于他县。袁化中饮冰茹蘖，不染苞苴，誓与百姓同患难。他先鼓励民众垦荒农桑，对稼穑优异者公开旌表褒奖；再清理积压多年狱讼，惩治怙恶不悛的罪犯，还百姓公义；最后劝民以德，教人谦恭礼让，提倡邻里街坊和睦相处。久而久之，当地民俗为之流变。多年后修纂的《泾阳县志》，将袁化中列入“名宦”，言辞中颇见怀念之意，“恺悌乐易，接士民若家人父子，古召公之流也”。

召公为西周初年分封的燕国国君。史载他治理西方，甚得民兆和，“召公巡行乡邑，有甘棠，决狱政事其下，自侯伯、庶人，各得其所”。后世以“甘棠遗爱”来赞颂循吏良官的政绩，袁化中得“召公”的美名，循吏之誉实至名归。

袁氏后因弹劾魏忠贤下狱，关在锦衣卫北镇抚司，成了在册的皇家钦犯。一般人畏祸，不敢发一言，唯独户部郎中、泾阳人韩琳受泾阳百姓之托，贿赂牢狱官差，冒死探视，送去衣食，相与泣涕终日。袁化中哭着告诫他：“希望不要再来了。我们触犯了皇帝的逆鳞，最终有了这样的灾祸。但先生您可不能这样，您不要再来了。”但韩琳仍数次探视，尽力周济。

袁化中死于阉党事后，泾阳百姓呼号痛哭，“袁父母虽死，吾等岂能忘其恩德”，遂修祠以祭祀。

拒泾水用北泉，辟群议泽被后世

令泾阳百姓最为感念的，是袁化中冒“邻县”之大不韪，辟群议，拒泾水用北泉，极大地减轻了民力负担。

泾阳农业生产，基本倚靠渠道灌溉。而几乎所有渠灌，都离不开泾河水供应。

袁化中上任时，渭北农业灌溉面临极大危机，“凿吊儿嘴”之议也争论得如火如荼。

引泾水利，解决了农业水源燃眉之急，却也埋下了长久的难题：泾水富含沙石，引水时间一久，泥沙势必淤积引泾渠口。而且泾河进入渭北醴泉、三原、高陵、临潼五县民众，前后历经十七载才完工。时人彭华在《重修广惠渠》中记录了此次开山凿岩的艰辛：“服役的百姓打着灯笼入隧道，遇到顽石炭炙醋淬许久才能凿穿；有时石洞泉水滴沥如雨，须戴斗笠披蓑衣方可施工。”

广惠渠工程旷日持久，征发民众极多，可仅用二十余年就因渠崩而重修。又十余年，又因淤塞修浚。此后广惠渠屡兴屡废，引泾水利陷入困境。有些人便主张打开“吊儿嘴引泾”。

吊儿嘴地势较高，毗邻泾河。许多人认为，凿开吊儿嘴，不仅能引泾水，更可冲刷渠道。此论一出，在渭北颇有市场。

万历年间，三原县人王思印赴京上本，请开吊儿嘴连接广惠渠，但工部久议未决。

面对汹涌澎湃的引泾论调，袁化中经过详实调查，独力辟之。万历四十年，他写《开吊儿嘴议》，明确提出“拒泾”主张，提议专用泉水灌溉。

袁化中认为，秦汉修筑郑国渠、白渠灌溉渭北，皆有地势的便利，“河势犹宽平也，山足犹易凿也”。而到了北宋修筑丰利渠，工程虽然艰辛，但收效甚微，“渭北获利不到数年，渠口又高，河堰日坏，泾水不能入”。元代王御史渠，于丰利渠口上游开石五十一丈(156.7米)，可不出数年，又崩坏。

历经17年修成的广惠渠，袁化中更认为得不偿失，“水渠修成而官民已筋疲力尽，但淤积的隐患却丝毫没有减少。”现在有人提议继续上移渠口，开吊儿嘴接引泾水，这在袁化中看来结局恐怕是“亦废同广惠耳”。

袁化中认为，如果能以开吊儿嘴所需物力的十分之一，收北山泉水来灌溉，所费甚少而所获糜多。他在奏疏中，认为开吊儿嘴是“只知道要开，却不知道开口之后同样无用”，而收北山泉水则“利关万世”。他奔走疾呼：“事固不小，虚糜脂膏，事亦匪轻，愿当事采择焉。”

袁化中“拒泾”以史实为依据，告诫世人一方面引泾难度愈来愈大，一方面冲刷淤塞获利时间不长，其弊已远大于其利。

“袁化中的奏疏，不仅一针见血地道破修渠耗尽民力的事实，而且提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。他主张的‘虚糜脂膏’‘凿渠苦民’仁政理念，至今都有借鉴意义。”孟书军说。

因为袁化中极力反对，开吊儿嘴虽有争议，却未曾实行。

清初时，金汉鼎任泾阳知县。他在任上主持过泾渠疏浚，深知修渠的艰辛和不值，“泾水河身日益凹陷，渠口日渐抬升，河渠渐不能用。于是征发五县的民众服徭役，我们伐石截木，置囤入水。当年十月开始施工，寒暑昼夜不停，直到第二年入秋才勉强完成。官员为尽快完工督责不休，百姓因而筋疲力尽，苦不堪言。他们不断上访，恳请哪怕不要灌溉了，也不想受这样的磨难”。他甚至由今思古，感慨引渠弊端，“战国时韩国本想让秦国疲于修渠，哪知道后世将因此更加疲惫”。

金汉鼎盛赞袁化中“拒泾引泉”的主张：“前朝泾阳知县袁氏化中，倡议拒泾而引泉，实为高论……今凿石渠数丈，得泉源焉。泉水喷涌而出，四时不竭……我本是为疏通渠道而到此，未想竟开辟又一个泾渠。以后不再需借用泾水了，这是天意，还是地意，还是人力啊，真是奇怪。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但袁化中的意见，并非没有反对者。清初高陵知县熊士伯指责袁化中：“这是自私自便的有害说法，是将数千年来最大的便利毁弃，着实可惜。”

雍正时，官府再次修筑水渠。但未及数年，再次淤塞荒废。乾隆时，朝廷终于定下“断泾用泉”的决断。而此时，距离袁化中离世已百余年了。

擢升言官御史，谏言时弊不惧艰

泰昌元年(公元1620年)，任泾阳知县的袁化中，于吏部考核得“优异循吏”的旌表，被提拔为御史，进京为言官。

此时袁化中的同榜进士杨涟等人也跻身言官序列。袁化中钦佩杨涟、左光斗等东林党人的公正清廉，与他们声气相投，仗义执言。

这一年，大明王朝流年颇为不利。先是初秋时，御宇四十八年的神宗病逝。一个月后，光宗也因离奇的“红丸案”去世，16岁的朱由校继承帝位。

帝国边疆同样进入多事之秋。此前一年，兵部右侍郎杨镐率领的明军在和后金军的“萨尔浒之战”中惨败，关外大片国土沦丧。袁化中刚上任，便上疏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。他认为方从哲身为首辅，行事却模棱两可，不以原则为要，以致朝政糜烂、边疆不振，应负领导责任。奏疏呈上后，百官惊诧于他的勇气魄力，在背后皆为他感叹不已。

袁化中信奉“在其位谋其职”的理念。其任基层，务兴利除弊，以去疾苦、促富足为己任；及作言官，也要不避斧钺，敢于言事。他连续上疏数篇，直斥边疆危机、军饷拖欠等敏感问题，发声直言，切中要害。

天启元年(公元1621年)二月，袁化中向皇帝提出八个积存已久的朝政弊端，即“宫禁渐驰；言路渐轻；法纪渐替；贿赂渐章；边疆渐坏；职掌渐失；宦官渐盛；人心渐离”。

“他的意见非常恳切，也切中时弊。尤其是意识到宦官力量的恶性膨胀，确实眼光长远。”孟书军说。

皇帝因其“剀切”，让他巡按宣府大同之地。袁化中未及上任，便以母忧归乡。后补为河南道监察御史。

当时皇帝不理朝政，大太监魏忠贤揽政擅权，引起朝内“清流派”东林党的不满。魏忠贤在朝臣中培养私人势力，笼络被东林党排斥的大臣，逐渐形成“阉党”集团。此后东林党和阉党，争斗不息。杨涟等人一直寻找罢黜魏忠贤的机会。

天启四年二月，东林党首领赵南星任吏部尚书，掌握铨衡大权。同时魏忠贤因小过被皇帝责罚，令其待罪私邸等候发落，外廷传言魏忠贤已失帝心，朝不保夕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觉得弹劾魏忠贤的良机已到。

该年夏，杨涟向皇帝进呈长篇奏疏，弹劾魏忠贤“怙势作威，专权乱政，欺君蔑法，无日无天，大负圣恩，大干祖制”等二十四大罪状，希望皇帝能“乞奋乾断，早救宗社”。

石破天惊的奏疏递上后，没了主意的魏忠贤惶恐不安。他先向东林党元老、内阁首辅韩爌求援，希望他能出面调停，息事宁人。韩爌本就不待见魏忠贤，此时更不理睬他。

魏忠贤无奈，跑到皇帝面前哭诉忠心和遭遇。皇帝与他相伴多日，见一直陪伴左右的魏忠贤老泪纵横，难免心软。皇帝向外廷传旨，斥责杨涟“凭臆结祸，是欲屏逐左右，使朕孤立于上”。皇帝还不忘警告众臣，“大小各官，务要尽职，不得随声附和。有不遵的，国法俱在，决不姑息”。

诏书下达，左光斗、魏大中、袁化中、周朝瑞、顾大章等人纷纷上疏声援杨涟。袁化中率十三道御史联名上疏称：“魏忠贤障日蔽月，逞威作福。将大臣当作奴隶，斥责言官如同幼鸟，草菅内外廷官员性命，以致朝野共危，神人胥愤。因为陛下此前并不知晓，他尚有畏惧之心。如今杨涟已弹劾奏报，陛下感念做太子时魏忠贤的功劳，想免魏忠贤一死。可他最害怕的便是身死，若是孤注一掷，铤而走险，我等担心其宣泄愤怒的对象不在缙绅，却在陛下。陛下想一想，深宫之内，让多疑多惧之人平日陪侍左右，难道不该有所提防吗？”袁化中的疏奏递上，魏忠贤大恨之。

等到前任首辅叶向高因病告归，唯一掣肘魏忠贤的力量也不复存在，党祸便顺势爆发了。

袁化中闻听抵抗后金的边将毛文龙，常以百姓头颅充当敌首，以孩童充当战俘，来套取朝廷封赏，便请求惩办毛文龙的不法行为，连带处置朝中靠山。接着他又弹劾阉党头目崔呈秀任淮州、扬州按察使时贪赃枉法。但这些奏疏皆被阉党扣在手中，皇帝并没有看到。

为国除恶未果，六君子惨死诏狱

暴风雨之前的宁静，散发着窒息的死亡之气。东林党和阉党已势同水火，难以共存，决裂只是早晚事。数月之后，阉党出招，一击致命。

阉党成员、阁臣魏广微先打头阵。他靠魏忠贤的关系，官运亨通，却遭清流的鄙夷和弹劾，因此深恨杨涟等人。他向皇帝诬陷：“杨、左、袁、魏诸人，与诸臣轻蔑主上年幼，便结党擅权。如果不尽窜杀，难以彰显帝王权威，慑服天下轻蔑之心。”明熹宗最恨结党，认为他言之有理，魏忠贤得以肆行构陷东林党。

在阉党的蛊惑和怂恿下，皇帝下旨切责杨涟和袁化中等，“公然欺朕幼冲，真老奸巨猾，顽钝无耻……恣肆欺瞒，大不敬，无人臣礼，都著革了职为民”。

让皇帝坚信杨涟、袁化中营私结党后，阉党继续寻找置其于死地的借口。魏忠贤起先想借“移宫”案来整肃杨涟，但阉党成员徐大化却认为不妥。他觉得，“彼但坐移宫罪，则无赃可指，不如坐纳熊廷弼贿，则封疆事重，杀之有名”。“移宫案”牵涉杨涟、左光斗，却与顾大章等人无关。熊廷弼行贿案，却能将东林六君子受贿案坐实，一窝端掉东林党。

《碧血录》中“东林六君子”插图，右上为袁化中

狱中羁押的熊廷弼不知道，他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，也成了东林党的催命符。

熊廷弼此前在辽东经营抗金，颇有成效，可惜因朝臣掣肘黯然离职，辽东形势转安为险。辽东险恶之时，他官复原职，却因和同僚王化贞关系紧张，造成明军惨败。明熹宗一怒将他下狱问罪。熊廷弼在狱中，觉得自己并无致命过失，四处行贿托关系求生。

熊廷弼找到了一个本该能救自己，却断送了自己性命的人——东林党智囊、中书舍人汪文言。

天启五年，锦衣卫以涉嫌受贿抓捕汪文言。魏忠贤让酷吏活阎王许显纯亲自审讯汪文言，问杨涟、左光斗、袁化中等17人受贿情状。汪文言颇有风骨，虽受尽折磨却答：“我不认得。此俱是正人，如何有赃？”许显纯无计，便将汪文言折磨致死，撕掉真实证词再伪造一份。

这份伪造的供词里，东林党人“无所不牵引，而以涟、光斗、大中、化中、朝瑞、大章为受熊廷弼贿”，其中杨涟、左光斗各受贿白银二万两，魏大中三千，袁化中六千，周朝瑞一万，顾大章四万。他们收到钱后，便上疏替熊廷弼开脱罪责。

皇帝阅后大怒，认为东林党平日满口仁义道德，私下一肚子男盗女娼。他随即下旨：“杨镐、熊廷弼既失封疆，又用贿买杨涟等，希图幸脱。杨涟、左光斗、周朝瑞、魏大中、袁化中、顾大章俱著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。”

六君子先后被投入“诏狱”。“诏狱”是专门羁押钦犯的地方，设在锦衣卫管辖的镇抚司。诏狱裁量权极大，可以自行逮捕、刑讯、处决犯人，不必经司法机构审判，进去容易出来难。

天启五年六月二十七日，诏狱土地祠前树下无故生出一株六瓣黄芝。次日，六君子悉数押来，黄芝似有感应光彩映人，有人认为这是吉兆。顾大章却叹息说：“黄芝，瑞草也，而生于狱，其妖乎？”

当日傍晚，许显纯第一次提审六人。六君子为官清正，自然对答得体，但仍不免受酷刑。史载“六君子各打四十棍，拶敲一百，夹杠五十”。

七月初四，许显纯再次提审六人。经不断折磨，六人“一步一忍痛，声甚酸楚”，“诸君子俱色墨而头秃，用尺帛抹额，裳上脓血如染，杨公须白为最”。到堂上后，“举头欲辩而口不能言”，“伏地若死人”，其状惨不忍睹。

此后，诸人皆轮番受非人虐待，以致“大号而无回声”。左光斗见状，向众人建议，可假意承认受贿，待再审时翻供，也许能重见天日。其余五人觉得有理，便承认了受贿一事。可许显纯却每隔五日刑讯，逼迫他们吐露所谓“赃银”，六君子后悔不已。

后来魏忠贤降中旨，斥责许显纯追缴赃银不利，连降三级。许显纯遂将刑讯改为三日一“比较”，施虐更无所不用其极。

在轮番折磨下，六君子形销骨立，不似生人。七月二十四日晚，杨涟头部被敲入铁钉致死。第二天，左光斗狱中遇害。次日，魏大中身死。

八月十九日，经家人多番筹措，“赃银”缴纳完毕的袁化中也被折磨致死。死前他“大呼高皇帝及列祖列宗”。死后，狱中鬼哭神嚎，凄厉骇人。二十二日，袁尸出诏狱，已无全身，家人以布包草草安葬。

八月二十八日，同样缴完赃银的周朝瑞也被折磨致死。九月十五日，六君子唯一幸存者顾大章自尽，他于前日“勺水不饮，鼓后服毒不殊，次夜投缳而逝”。至此，六君子全部壮烈捐躯。

六君子身亡，魏忠贤仍不解气。他令人编纂《东林点将录》，将东林党人按照《水浒传》的名号登记造册。袁化中的称号是马军五虎将之一的“天立星双枪将”。

崇祯初，东林六君子悉数平反，朝廷赠袁化中太仆寺卿，官其一子，南明时谥为忠愍。惠民百姓为他立起双忠祠，定时祭祀。

东林书院

·相关阅读·

随着东林党和阉党争斗的发展，“持正”的东林党人玉碎就义，生还之人则走向“门户”之见、党同伐异，明朝也在党争倾轧中走向末日。

从持正到门户：与国偕亡的明末党争

□ 本报记者 鲍 青

明季党争，肇始于神宗万历时。万历二十二年（公元1594年），吏部郎中顾宪成被削职为民，放归田园。他在故乡修葺宋时东林书院，与高攀龙聚众讲学，阐发治国理政的见解和主张。

此时明朝政治腐朽衰败、社会矛盾激化，他们“应时而作”，讲学中针砭时弊，讽喻朝政，褒贬官吏，声望日隆。顾宪成积极联络朝中故友，举荐人才，贯彻自己的主张。

顾宪成所提倡的廉正奉公，廓清吏治，开放言路，革除积弊，在暮气沉沉的晚明，犹如澄澄清流，深得文人认同，一时“士大夫抱道杵时者，率退处林野，闻风响附”。

东林党的异军突起，引发了守旧势力的紧张和不满。他们分为楚、齐、浙等党，“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”。

东林党因拥戴朱由校即位而获重用。当时内阁首辅刘一景、叶向高，吏部尚书赵南星、礼部尚书孙慎行，兵部尚书熊廷弼等大臣，都支持东林党澄清吏治，匡扶社稷。大批东林党人跻身仕途，掌控朝廷军事、政治、文化和监察大权。他们利用“京察”和“大计”，对官员考察品论，“狭而私者”罢黜，“宽而公者”提拔，慢慢“东林势盛，众正盈朝”。

可极盛之际也是衰败之始。东林党不懂得妥协的政治艺术，过于注重“名节”。考察官员，总体虽称“持正”，却已显出“门户”偏见。对于认同自己的，同志友人，笼络有加；反对的，穷追猛打，不遗余力。失势者聚集在宦官魏忠贤周围，形成阉党集团，伺机对东林党人打击报复。

朝廷形成了两大针锋相对的集团，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。东林党上疏弹劾魏忠贤，有二十四大罪状；阉党举报东林党“名清实浊”，收受疆臣贿赂。因为有皇权庇佑，阉党对东林党形成压倒性优势，东林党精英如杨涟、左光斗就义理想，玉碎信仰，东林党严重受挫。

不久崇祯即位，见魏忠贤威胁皇权，便翦其羽翼，瓦解阉党，东林党再受重用。如果说早期东林党尚重“持正”，那么在经苦难磨砺后，价值观却发生扭曲，愈发偏狭自私。

崇祯面对的是糜烂不堪的烂摊子，“今日吏治、民生、夷情、边备，事事堪忧”。“此时不矫枉振颓，太平何日可望”？为中兴明室，崇祯食不甘味、寝不安枕。但朋党之争的顽疾积重难返，士大夫“各是所是，各非所非，恩怨相寻，冰炭互角”。崇祯长叹：“诸臣但知党同逐异，便己肥家！”失望之情难以掩饰。

党争消耗着统治力量，终于将王朝导向深渊。1644年，北京城破，崇祯身亡，天下无主。由谁即位，遗臣又出现两种意见。马士英主张立福王朱由崧，东林党则要立潞王朱常淓。最终朱由崧登帝位，成立南明小朝廷，引起东林党不满，党争不灭反炽。一年内就发生了质疑福王合法性的三大案：“妖僧”大悲案、太子案、童妃案。

一面是君王面对党争困局，束手无策，耽于享乐；一面是朝臣斗得不亦乐乎，终于使清军南下，社稷倾覆，神州陆沉。反清义士夏允彝便说：“东林之持论高，而于筹边制寇，卒无实着。”明末遗臣戴名世慨叹说：“呜呼，南渡立国一年，仅终党祸之局。东林、复社多以风节自持，然议论高而事功疏，好名沽直，激成大祸，卒致宗社沦覆，中原瓦解，彼鄙夫小人，又何足诛哉！”

明末党争给清初官员的印象深刻。清人温睿临在《南疆逸史》中说：“明朝之亡，始于朋党，成于阉竖，终于盗贼，南渡继之。”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在训斥故明旧臣时也不留情面：“故明诸臣，各立党羽，连章陈奏，陷害忠良。无辜被罚，无功滥用，酿成祸患以致明亡。”